

壹、緒論

教師專業化歷程中，職前階段師資培育機構所安排的課程內容及實務經驗，都是促進教師候選人（teacher candidates）或在我國脈絡中的師資培育生（簡稱師資生，為取得教師證書前的學生，包含實習學生）養成教師專業知能。然而，師資培育機構安排的師資培育課程及學校實務經驗，對於師資生如何習得教學專業知能是未知的，呈現一種「黑盒子」（black box）狀態（Darling-Hammond, 2006, p. 303）。儘管師資培育歷程有待釐清，但師資培育的成果是可以從師資生的專業表現、教師資格考試成果，以及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影響程度等方式獲得證實（Cochran-Smith, 2001）。然而，以這三種方式確認與師資培育的關係是有難度的，如以師資生的專業表現而言，專業表現如何界定與如何評量，其評量工具為何的問題即會浮現；教師資格考試成果是否能夠證明教師專業知能活用程度，受人質疑（洪志成，2005；葉連祺，2004；Darling-Hammond, 2001；Dunkin, 1997；Haertel, 1991；Wilson & Youngs, 2005）；教師教學表現與學生學習成就，如未進行學生學習前、後測，則難以推論與教師教學有所關聯，而教師教學表現也難以證明與師資培育有直接關係（Darling-Hammond, 2006, p. 121）。是以，從上述三種方式來確認師資培育成果有其難度。

另一方面，確認師資培育成果可以從師資生的教學效能（teaching efficacy）加以檢視，如 Darling-Hammond、Holtzman、Gatlin 與 Heiling（2005）的研究結果顯示，教學效能與師資職前培育有高度關係；而這樣的結果，與 Housego（1990, p. 54）、Siwatu（2011）、Zientek（2006）調查教學準備度（teaching preparedness）是來自於師資職前培育的結果相似。是以，經歷師資培育者的教學準備度，是評估師資培育成果的重要來源。因此，教學準備度或教學效能是用來瞭解師資培育成果的另一途徑。相對而言，畢業生或實習學生的教學準備度或自我效能之知覺，都可以且應該回應到師資培育歷程的成果，顯示畢業生知覺教師專業知能是具有評估師資培育的效果（Housego, 1990；Soodak & Podell, 1996；Webster & Valeo, 2011）。另外，Kee（2012）曾以畢業生教學準備度來瞭解美國境內各種取得教師證書培育管道的差異。是以，師資生教學準備度不僅可用來展現師資培育成果，更可用以區分不同管道取得教師證書的培育成果之證據，有助於用以瞭解我國多元師資培育機構的培育成效。而教學準備度的測量方法，包括指導者觀察師資生的表現（Lotan & Marcus, 2002），或進行教學知識的測驗（Schultz, 2002），或初任教師的調查（Darling-Hammond, Eiler, & Marcus, 2002），都是蒐集師資生教學準備度證據之方法，本研究採實習學生的調查，應對師資培育歷程的反思，也可以評估師資職前培育課程或歷程進而設計與調整之參考，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實習學生的教學準備度知覺，不僅是師資職前培育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甚至是教師教學效能的重要指標（Brookhart & Loadman, 1994；Housego, 1990, 2006）。在我國師資培育脈絡

中，實習學生是修畢教育專業課程，且初次全時處於學校環境中，對於教師專業知能有著剛習得且可運用於實際之時機，應是非常重要的調查時機點，既可以回應師資培育歷程，也可回應我國多元化師資培育政策與相關制度，是否會因為師資培育機構不同，而培育出具差異的教師專業知能，都可以有驗證的效果，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因此，本研究將配合實習學生背景變項檢視是否會因多元師資培育機構，而在教師專業知能上會有所不同。

實習學生的教學準備度，是以「教學」為特殊情境的構念（孫志麟，2009），檢視教學專業知能在師資培育歷程的養成，著重讓實習學生能夠具備教師在教學情境下的學生、課程內容、環境的教學三角概念之知能（Cohen, Raudenbush, & Ball, 2003）。此三角概念形構出教師教學工作多面向的樣態，特別是教師自身的生活與經驗、專業認同、價值和意識形態都會與學生的正式和非正式互動、與課程內容深廣度、與社會政策文化環境等面向產生關聯（Britzman, 1986; Lampert, 2009）。因教學情境的複雜性，迫使教師必須在特定時間下回應不同學生的需求而進行判斷，致使教師教學工作看似簡單，但卻有著相當的難度和複雜度（Labaree, 2000）。由於教學工作的難度與複雜度，使得師資培育機構必須在培育歷程中安排各種課程、教學、實習學校、實習輔導教師、師資培育者等有系統的學習架構（Wideen, Mayer-Smith, & Moon, 1998），讓實習學生習得相關教學知能，並且能夠提供實際場域讓實習學生可以將理論運用於實際，從實踐的過程中感受到師資培育機構提供培育的情形，而實習學生感受到師資培育機構培育歷程的完善程度，是自我效能與專業認同的最佳預測因素（Schepens, Aelterman, & Vlerick, 2009）。有鑑於師資培育歷程提供培育的完整性會影響到實習學生習得教師專業知能，以及運用在實際的情形，並從中獲得的感受，使得本研究即從實習學生教師專業知能的習得、運用及重要性感受切入，用以瞭解師資培育成果。

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目的是以實習學生為對象，採用調查研究來探究實習學生知覺教學準備度，包括對教師專業知能的習得（實習學生知覺學習到的教師專業知能），以及教師專業知能的運用（實習學生知覺到教師專業知能運用情形）、重要性（實習學生知覺教師專業知能的重要程度）之關聯情形，探究彼此間的關係，用以瞭解我國師資職前培育成果，檢視我國多元師資培育相關政策或制度。因此，本研究將先確認「習得」、「運用」與「重要」三者的結構路徑關聯後，再分析三者之間的關係，用以瞭解我國師資培育成果。本研究之問題包括：

一、實習學生教師專業知能習得、運用與重要程度的結構路徑關係為何？

二、實習學生教師專業知能習得、運用與重要程度描述統計與相關情形，呈現師資培育成果為何？

三、實習學生背景在教師專業知能習得、運用與重要程度之差異情形，展現出師資培育成果的差異為何？